

杜闻贞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A photograph of a snowy landscape with three bare trees against a blue sky. The trees are silhouetted against the sky, and the ground is covered in a layer of snow. The sky is a deep blue with some light clouds.

一个
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

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

杜闻贞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书 名 一个幸运知识分子的坎坷
著 者 杜闻贞
责任编辑 戴同华
特约编辑 金海峰
责任监制 王列丹
出版发行 江苏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南京中央路 165 号
邮政编码 210009
印 刷 者 淮阴新华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7.625 插页 2
印 数 1—1040 册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1999 年 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214—02336—9/G·717
定 价 14.00 元
(江苏人民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杜闻贞，男，1930年2月生，南京大学国际商学院教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证书获得者。195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经济系，1957年复旦大学经济系研究生毕业。曾任南京大学学报主编、经济系系主任、国际商学院副院长等职。



1990年在伦敦马克思墓前。

自序

—

我想写点自己的经历，最直接的原因是觉得这 65 年走过来不容易。解放前失学失业，处处陷阱，要保持洁身自好固属不易，更难得的是我最终选择了光明，来到了解放新区。而且解放前的这段历史，又为解放后四十多年的发展作了铺垫，个人的历史是不能割断的，总有它的来龙去脉。

解放后个人的历程，是与新中国的成立、成长、曲折发展的历程相一致的。三年恢复时期，我读完大学；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我走上工作岗位，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的教育事业，把个人的发展与国家的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尽管我写的是个人经历，但却反映了时代的特征，勾画出了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所走过的共同道路。

我们这一代是新旧交替的一代，既有旧社会的苦难，又有新社会的磨炼。由此而接触到面貌迥异的各色人物，给了我各种不同的政治思想影响，促使我在复杂的事物面前，有了更多的思考。书中有五四时代的宿将，民国时期的名流，以及解放前夕跑出来寻找出路的诸多角色；还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入党的领导干部，从旧社会过来的留学英美的教授，奋战在各条战线上的我的同龄人，和以“老三届”为代表的我的下一代；还有苏联、美国、英国等国的专家教授。可以说，这个反映时代特征的

作品，是以众多的有血有肉的人物构成的，而不是枯燥的历史实录。

在这样一个伟大的时代，经历了那么多重大的事件，我又在南京大学这样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因此，在这部作品中不仅有历史背景，各色人物，还有作者自己的心态，当时的思想状况，即在一件具体的事情面前，我为什么这样决定，而不用另外的方法处理，具有鲜明的个性。我不是思想家，但我有思想的素材，思想的习惯，思想的时间。所以，这部作品虽是白描性的客观事实，但又记录了蕴藏在心灵深处的一些思想活动。这也算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特点吧！想得多，无病都会呻吟，何况碰到那么多疑难杂症，当然就更加要浮想联翩了。

二

个人想写是回事，如公开出版，社会效果又如何呢？这也是我考虑的一个问题。现在有人说，“文化大革命”的东西不好写。其实，像我辈及上一辈的人要写自传体的作品，不可能回避这段历史，抹去这类内容，问题是从什么角度来写。

这本书并没有专门写“文化大革命”的意思。它不是全面论述、描述“文化大革命”，而是从一所高等学校、一个知识分子的遭遇，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落实了政策，我忘我地工作，完全是以一种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过去的事情的。这正是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可贵之处，只要有个能发挥作用的岗位，就不计前嫌地干起来。真是棒打不散，再大的委屈最终还要跟共产党走。这也是向当今青年进行传统教育的重要内容。正面讲道理是教育，叙述一代知识分子的具体经历是更形象、更生动的教育。

“文化大革命”都过去三十二年了。以史为鉴，无论是经历过、还是没经历过的人，都应该引为教训。历史不会简单地重复，但谁

又能保证,在适宜的土壤、气候下,不会有人再去做傻事、蠢事和疯事呢?有位作家讲得对,要终结“文革”,惟有彻底真实地记住“文革”。这不是向人们唤醒仇恨,重现悲苦,而是冷静地反思,痛彻地醒悟。这将有利于我国安定团结局面的发展和人民道德水平的提高。

三

本书所写内容都是真实的,书中提到的人物不少,有真名真姓的,有谐音的,还有仅提其身份、职务的。初稿于1996年写成,书中涉及的人与事截止1995年,1998年补序。初稿写完后,我曾请余孟仁、文一 etc 同志看过,他们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特约责任编辑金海峰同志对书稿提出了不少重要修改意见,在此一并致以谢忱。我还要感谢江苏人民出版社领导的理解与支持,使书稿得以出版。

在回溯成书的过程中,我一定要提及我过去的一些研究生。他们中的有些人在读书时就知道老师的这个心愿;当我退下来,有时间、精力来实践这个愿望的时候,他们还不时地询问、鼓励;当书稿写成出版遇到困难时,还给予了资助。没有他们在精神上或物质上的帮助,这本书是出不来的。

明年是建国50周年,又是我虚龄70岁,仅以此书作为纪念。我由一个小青年而变成七十老人,是与新中国的成长同步的。“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真能做到,就算幸福的晚年了。

杜闻贞

1998年9月10日 教师节

目 录

第一章	旧社会的十九年.....	1
	1930 年出生于江西吉安。	
	失学失业的痛苦,迫使自己来到了解放新区。	
第二章	我的大学生活	13
	新中国成立入校,第一个五年计划前夕毕业,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第一代正规大学毕业生。	
第三章	助教——研究生	21
	毕业、留校、“双肩挑”,超负荷运转。	
	在“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声中成为苏联专家的研究生。	
第四章	急风骤雨锻炼人	29
	在全面“大跃进”中,所在的工作单位被评为校、省、全国的先进,我却累得病倒了。	
第五章	在游泳中学游泳	39
	“大红人”变成了“黑干将”。	
	在游泳中学游泳,差点儿淹死了。	
第六章	“群众专政队”	49
	被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队”关了四年,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	
第七章	天方夜谭	55
	“历史问题”、“现行问题”轮番逼供。	
	我深信“好人是不寂寞的”。	

第八章	学习使空虚的生活充实	62
	在关押时,抓紧充实自己,逐步扩大阅读面。	
第九章	深挖“五·一六”运动	70
	从“现行”到“历史”,再回到“现行”。	
	在严峻考验面前,我不知是失败了,还是胜利了?	
第十章	“高级政治犯”	85
	先给点“控制下的自由”;	
	后下农场,“边劳动,边交代”。	
第十一章	四下农场与“客串”大文科	94
	提出落实政策的十大问题。	
	先后至农场“任职”,再“客串”大文科。	
第十二章	工作与“靠边”几相等	101
	读完了《鲁迅全集》,又读《论语》、《资本论》。	
	工作时间与等待工作的时间几乎相等。	
第十三章	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110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出任经济系系主任。	
	一心想把耽误的时间补回来。	
第十四章	“唱支山歌给党听……”	120
	在党的生日座谈会上直抒己见。	
第十五章	八十年校庆与毕业三十年	127
	离散 30 年的同窗好友重聚首。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第十六章	费时伤神又四年	133
	“民主”选举系主任。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第十七章	群众的信任是最高奖赏	145
	由系到院当领导。	
	学校第三次为我装住宅电话。	

第十八章	初涉伦敦.....	153
	我终于出去了。	
	恩格斯赞美的伦敦,如今更加雄伟,更加壮丽。	
第十九章	里兹大学.....	163
	里兹大学的学习生活是丰富多彩的。	
	如果时光能倒流,在这样的环境里	
	是可以做出学问来的。	
第二十章	曼彻斯特—利物浦—伦敦.....	178
	为去美国、布鲁塞尔、香港等地申办签证。	
	离开英国的前夕,敬谒马克思墓。	
第二十一章	布鲁塞尔—卢森堡.....	189
	参观欧共体总部、美军阵亡将士墓、滑铁卢、	
	古镇的木马节等,使我领略了欧洲的历史陈	
	迹、现代繁荣以及乡土文化。	
第二十二章	芝加哥.....	198
	一天跑三个国家、四个国际大都会,	
	地球真变小了。	
	对发达国家的城市化有了感性认识。	
第二十三章	华盛顿—匹兹堡.....	208
	华盛顿是美国最有看头的地方。	
	“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	
第二十四章	从香港入境.....	217
	我对香港既熟悉又陌生。	
	老马识途,我绕地球一周又回来了。	
第二十五章	晚来的“收获季节”.....	227
	好事不少,收获颇丰,只是来晚了点。	
	岂能尽如人意,只求无愧我心。	

第一章 旧社会的十九年

一

我原籍浙江绍兴东关镇(现属上虞)。祖父是个老童生,悒悒不得志,36岁病故。祖父临终时要我父亲立志“学手艺”,决不走“仕途”。于是,父亲年轻时就离开老家,一个人到江西吉安“成家立业”了。他学的是洗染手艺,先帮人,后合伙,再独立开店当老板,但一直参加主要劳动,因此,我的家庭出身是手工业者。解放前三年,我家已濒临破产,只能维持生活,虽还开了个店,但没雇人,父亲带个亲戚劳动。

我1930年2月在江西吉安出生时,正逢上红军“十万工农下吉安”,我家没像地主老财那样跑省城、跑上海,因为我们是异乡人,又是手艺人。后来听父母告诉我,红军住我们家很守纪律,用门板睡觉,第二天一早上好门板,打扫得干干净净才走。红军中还有两位浙江老乡,给了我几枚铜板,所以小时我对共产党、红军不但没有恐惧感,反而有点好感。

我6岁读小学,12岁小学毕业。1942年夏,进入江西吉安县立中学,1945年夏,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初中毕业。

我读初二时,有一位江西中正大学电机系毕业的老师,教我们几何课,对我的政治思想影响很大。当时,学校从市场上买来一批课本,以比市场上贵得多的价格卖给我们,同学们都不愿意买,但吉安已经没有这种课本了,于是大家推我和另一同学一起到泰和

(江西省临时省会)去买。书买回来后,学校当局当然恨我们,我们也耽误了一些功课,感到有了压力。这时,这位老师支持我们,鼓励我们,帮我们补课,我从心里感激他,从此我们接触比较多。在后来近一年半的相处中,他主要给了我两点影响:一、“人是政治动物”,不能只埋头读书,还要关心“国家大事”;但学政治、搞政治是危险的,政治上失败就无退路了,所以要有“副业”,像他学电机就是“副业”,孙中山搞革命也有“副业”,就是当医生。我高中毕业后曾想报考工科也是受他的这种思想的影响。二、我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尤其痛恨日本飞机狂轰滥炸,我家就被炸过好几次,所以想报考空军幼年学校,当上航空英雄,报仇雪耻。但当我把这个“宏愿”告诉这位教几何的老师时,他却不欣赏,对我进行了“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教育,要我“不要给人家卖命,要自己干”。从此,我就不再想报考什么空军幼年学校了。

1945年暑假,我初中毕业后不久,抗日战争胜利了,我很想出去见见世面,想到南昌去读书。1946年春节后去南昌,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当时交通还不畅通,是坐木船去南昌的。我在南昌豫章中学只读了一个学期,高二又回到了吉安县中。1946年夏,我从南昌一回到吉安,就有人来找我,要我参加他们《雷雨》的演出,那时我十六七岁,正合剧中人周冲这个角色,我答应了。我还担任了学生自治会主席,主要活动内容也是唱歌、演戏、开运动会,我们又上演了两个多幕剧《愁城记》和《沉渊》。我不仅是这两部戏的演员,而且还负责筹备工作,这几乎占了我课余生活的全部时间。

高二时,学校发生了一起打倒军训教官的事件。吉安县中有个军训教官,平时对待同学粗暴,法西斯作风,大家很恨他,可他手中有权,嘴里经常说:“哪个调皮,我就打他军训不及格。”在当时军训不及格是要退学的,这个家伙又胖又矮,像个番薯,我们叫他“potato”。1946年下半年,我们抓住他粗暴对待学生的一件事,发动全校同学掀起了一个打倒他的学潮,我的记忆里并没有开全校

性的大会,而是约好各年级同学在某一天下午,大家都在自己的教室门口唱歌、喊口号,并在校园里走了一圈,是以这种方式来抗议示威的。我是负责编歌的。我用《大刀进行曲》的歌谱填上新词:

大刀向黄番薯的头上砍去!全校勇敢的同学们,

反抗的一天来到了,反抗的一天来到了。

前面有高中的老大哥,后面有初中的小弟弟,

咱们全校同学勇敢前进,看准那番薯,

把它挖出,把它挖出,冲啊,挖!

这个歌词是事先发到各个班去的,曲子本来大家都会,只需把歌词记熟就行了。事情发生后,学校当局采取了一些调和办法,把事情暂时缓和下去,但事后还是处分了学生。

高二时,王造时先生来学校作过报告,他是江西安福人,当时在吉安办了一家报纸,叫《前方日报》。1947年他回吉安一次,我们请他来校作演讲,我记得他演讲的内容是从他看过的电影《天堂春梦》谈起的,说有个工程师,原以为抗战胜利以后可以搞工业建设,有一套理想,但“春梦”破灭了,内战打起来了……王造时主张抗日,曾任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执行委员,1936年11月被国民党逮捕,是著名的“七君子”之一。他向全校作过演讲以后,我又专门请他到我们班上去解答问题。我首先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的教育经费太少,只占国家预算的0.5%,而军费却占了80%以上,以致大量青年失学、失业,老百姓生活困苦。王先生是参政员,应该向政府呼吁,增加教育经费,减少军费,不要内战,要和平……”说到后来,我激动得哭起来,说不下去了。

我担任学生自治会主席时,还经常收到香港《华商报》,究竟是谁寄给我们的,我不清楚。除《华商报》外,我家里还订了《文萃》、《周报》,开始接触一些进步书刊。

二

高三这一年,因为快要毕业了,要准备考大学,活动搞得不多。学校规定,高三学生不参加学生自治会工作,那一年,我只担任了学生代表会议的主席。学生自治会是这样产生的:先由各个年级推出代表,代表集中起来开个会产生自治会理事,理事再分工,我就是这个代表会议的召集人。按惯例,学生代表会议的召集人是由高三代表担任的,它的任务是年里开1~2次会,没什么经常工作。

吉安县中出墙报的风气很盛,内容大都是文艺性的,直接对国家大事发议论的不大见。我和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商量,要办一个墙报,刊头上要署名是由谁主编。大家讨论的结果就写“激流学社”主编,“激流学社”就是这样出来的。至于为什么取名“激流”,从我们当时的思想来看,主要是受了巴金小说的影响,巴金有个“激流”三部曲(《家》《春》《秋》),还有“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我们都爱读,也议论过,对我们影响较深,大家模模糊糊地有个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的想法,所以我们取名“激流”。

这个墙报不定期地出过两三期,后来大家事情较多,功课又重,就没有再搞下去。

1948年上半年,我们这几个人都快要毕业了,分别前,大家在一起照了相。照片拍过后,照相馆老板问我们要不要题字?大家对我说,“你来看底片时,就题几个字吧!”后来我就在照片上题了:“激流,激流,激激地流吧!”从当时的思想来看,还有到生活的激流中去的意思,所以才写了这么几个字。照片冲洗好后,各人都印了一张,留作纪念。

这个所谓“激流学社”,前后经过就是如此简单,可后来我为它吃尽了苦头。

1948年夏,我高中毕业了,当时一心想考大学,好像大学考取

了才有前途，考不取就一切都完了。我自己心里也有点儿数，国立大学考不取，私立的又没钱，为自己的前途而忧虑，但不考一下心里又不服，因此一毕业我就离开了江西吉安，到我的老家——浙江绍兴去了。这是我第一次回到老家，也是我第一次离开江西到外省去。我在浙江老家是住在绍兴东关镇我姑母家，姑母没有孩子，只有一个人，我住在那里很安静，很适宜温习功课。在那里住了一个多月，我就到杭州去投考浙江大学。在杭州住在浙江大学学生宿舍里，浙大进步同学对我们这些考生的工作是做得很好的，常来看望我们，还教我们唱歌、跳集体舞，我印象最深的是教我们唱“年轻的朋友一齐来，忘记你的烦恼和不快……”我们的住处也写了同样内容的大标语。那时唱那支歌，看到那样的标语，真是无限感慨，热泪盈眶——我正有忘不了的“烦恼和不快”，马上就要面临失学、失业的威胁，前途渺茫。

浙大考过后，我又到上海，报考复旦大学、交通大学，都没有考取，就又回江西吉安了。

三

失学、失业的滋味是不好受的，我回家后就躲在小楼上没有出过家门，一关就是好几个月。在这期间，我把全部时间花在搞“敲门砖”（当时把“数、理、化”看作是投考大学的“敲门砖”）和阅览报章杂志上。一直到1949年春节期间，我才出来跑跑。有一天我在街上碰到一位高中同届毕业同学，他告诉我，他在武汉私立中华大学先修班读书，并问我的情况怎样。我告诉他呆在家里很无聊，日子不好过。接着他又说：“最近还从河南迁来一所嵩华大学，也在武汉招生，这个学校准备不放寒暑假，用八个月的时间完成一学年的功课，中华大学先修班就有些同学转到嵩华去了。”我说：“那很好嘛！这样可以抢一年时间，用不着再读先修班了，你帮我联系联系，如

果学费不太贵，我倒愿意去嵩华大学。”他说：“我联系好了就告诉你。”十天左右的时间，他就通知我赶快去武汉办入学手续。

我筹了点钱，就动身到武汉去了。从吉安坐汽车到樟树，再改乘火车。在从樟树到株州的火车上，我认识了一对很年轻的夫妇，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他们是两个“文艺兵”，说的一口很漂亮的北京话，女的才十六七岁就怀孕了，男的年龄和我差不多，十八九岁，两人都很穷困潦倒的样子。通过谈话，我知道他们原来是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搞文艺的，他们不愿干了，自动离职，准备到桂林去投亲。我们在车上谈得很投机，分手时相互交换了通信地址，我还给了他们一些钱。我记得是在株州同时下车的，我换车往武汉方向去，他们往桂林方面走了。

我于1949年3月中旬到达武汉，嵩华大学是个“野鸡”大学，没有校舍，只借了一所中学的几间房子。入学不要考试，只要有钱就可以进去。几个所谓“教授”也都是些草包，根本讲不出什么名堂。我们入学目的也只是混个资格，但就连这一点也不能满足。入学不久，我和其他同学都先后发现这个学校没有立案，教育部、教育厅都不承认这个学校，就是说，这个学校的证件没有用，混资格都混不到，我们当然不答应。

有一天，我和其他几个同学一起去找学校教务长金众添，他是实际负责人。据说校长是河南的一个军阀，从未来过，是挂名的。我们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问题，要他把学校立案的证件给我们看，金开头用高压手段，骂了我们一通说：“没有这个必要，你们凭什么要看证件？谁不安心在这里学习，谁退学好了，不要在这里闹事。现在共产党就是到处闹事，闹学潮、闹工潮……”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这家伙还妄想用“红帽子”来压我们，但我们没有被吓倒，继续在同学中酝酿、宣传，事情越闹越大，有不可收拾之势。金众添着慌了，耍了一个鬼点子，出了一张布告：部派督学某某定于某日来校训话；并传出风声说这位督学大人要来证明嵩华大学是立过案的，

还要训斥我们这些闹事的学生。我们对这件事表示怀疑，于是派了一些同学到教育厅去打听消息。教育厅答复说：根本没有这回事。我们立即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同时又去找金众添，大骂他是骗子。金众添瘫下来了，承认嵩华是没有立案，是骗了我们，并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提出全部学费要退还给我们，他答应了。我们拿了二十几个银元离开了学校。大家吃了一顿，并在武昌蛇山黄克强铜像前拍了一张照片，以资纪念（参加拍照的是闹事的二十多个同学），我又在照片上题了字：“弱是罪恶，强而不暴是美”。从入学到离校，前后不到一个月，算是结束了这段“大学生活”。

在我到达武汉进入嵩华时，经人介绍，认识了匡吉，他原是中华大学先修班学生，后转到嵩华来的。我和匡吉住在一起，他和我同年，很健谈，对国民党反动统治有不满情绪，有点正义感。我和匡吉同吃住、同学习，接触很多，时间一长，我发现和他经常来往的还有几位年轻人，有小学教师、学徒、失业青年等。他们在日常的谈话中还是倾向进步的，还唱：“山那边好地方，穷人富人都一样……”等进步歌曲。

有一天，有个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来找匡吉，我说他不在，到汉口去了，这个人坐下和我聊起来，我才知道他是匡吉过去的老师，临走时给我一包东西，要我转交匡吉。他走后我把纸包打开来一看，原来是七八本毛主席著作，如《论联合政府》等。后来匡吉回来了，我把这包书交给了他。他打开来看过后说：“武汉快解放了，地下党活动得很厉害。”

后来，他公开告诉我，他们有个政党，希望我参加。我明确地拒绝了他的要求，表示不愿过早地决定自己的政治生命。我和匡吉是“萍水相逢”，过去根本不认识，相处才一个多月，我当然不会如此轻率地去和他搞在一起，况且，我实在也搞不清他的政治背景和身份。